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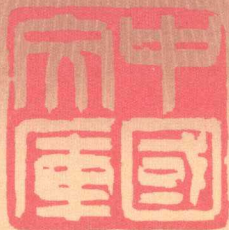
中国文库

· 史学类 ·

# 辛亥革命史

(下)

章开沅 林增平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文库

史学类

# 辛亥革命史

(下)

主 编：章开沅 林增平

本卷主编：王天奖 刘望龄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 目 录

## 下 卷

第十章 武昌首义 .....	929
第一节 首义成功 .....	929
起义的准备 .....	929
起义的胜利 .....	947
第二节 湖北军政府 .....	963
军政府的成立 .....	963
革命政策和《鄂州约法》 .....	977
武汉保卫战 .....	983
第三节 湖北各属的反正 .....	995
黄州、京山、汉川举义 .....	995
宜、荆、施脱离清朝统治 .....	1000
鄂北江湖会起义和襄、郟反正 .....	1005

第十一章 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	1028
第一节 各省(区)的起义和独立(上) .....	1028
湘、赣起义 .....	1028
秦、晋独立 .....	1032
上海、江、浙、皖起义和海军反正 .....	1037
两广、福建独立 .....	1048
云、贵、川的独立 .....	1054
第二节 各省(区)的起义和独立(下) .....	1062
直、鲁、豫革命党人的起义 .....	1062
东北和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	1078
西北甘、新各族人民的起义 .....	1087
西南少数民族的起义 .....	1093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 .....	1096
第三节 城乡人民的响应和清朝的解体 .....	1098
城镇的民主热潮 .....	1098
农村的反抗运动 .....	1103
清朝统治的解体 .....	1107
第十二章 “南北和谈”和南京临时政府 .....	1136
第一节 内外反动势力和立宪派人破坏革命 的活动 .....	1136
帝国主义列强的假中立 .....	1136

袁世凯的再起 .....	1146
立宪派的破坏和篡夺 .....	1152
第二节 围绕“南北和谈”的斗争 .....	1159
中外反动派的“打”和“拉” .....	1159
革命内部急剧上涨的妥协逆流 .....	1168
“南北和谈” .....	1176
第三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 .....	1184
筹建中央政权的激烈斗争 .....	1184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 .....	1191
“革命时代之政府” .....	1199
第十三章 辛亥革命的失败 .....	1226
第一节 中外反动派加紧内外夹攻 .....	1226
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 .....	1226
袁世凯的翻云覆雨 .....	1234
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拆台活动 .....	1239
第二节 革命营垒内部危机的加深 .....	1245
与工农关系的恶化 .....	1245
革命派的分化 .....	1256
孙中山“迫而牺牲革命之主张” .....	1266
第三节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	1274
革命派的节节退让 .....	1274

“逼宫”与“退位” .....	1279
孙中山无从改变败局 .....	1289
第十四章 余波——为挽救共和国而斗争 .....	1321
第一节 “二次革命” .....	1321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	1321
宋案 .....	1334
癸丑赣宁之役 .....	1345
第二节 反洪宪帝制斗争 .....	1361
洪宪帝制丑剧 .....	1361
讨袁战争 .....	1370
护国运动的成功与失败 .....	1383
第三节 护法运动 .....	1392
张勋复辟 .....	1392
护法战争 .....	1405

#### 附录一

(1) 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 / 章开沅 .....	1444
(2) 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 / 章开沅 .....	1473
(3) 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 / 章开沅 .....	1498

#### 附录二

(1) 大事年表 .....	1527
(2) 主要征引书目 .....	1556

# 第十章 武昌首义

## 第一节 首义成功

### 起义的准备

辛亥革命是以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胜利,给了清朝反动统治以致命的一击而迅速扩展为全国规模的运动的。

这次革命为什么不曾以参加群众较为广泛的丙午萍浏醴之役为扩展的契机?为什么迤邐相属的西南几次起义没有成为革命在全国蔓延的发轫?为什么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枪声不曾作为举国响应的信号?为什么黄花岗英烈们的殊死搏斗没能获致预期的成效?为什么武昌新军的一举反正却导致了首义的胜利和各省的云起风从?这是必须给以回答的一个问题。

武昌革命义旗于首义的次日黎明就飘扬在黄鹤楼上,看来是偶然的。就是当时公认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也不免感到有些意外。<sup>①</sup>然而,这个似乎是偶然的事变,是以历史的必然性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如果那时不曾具备导致推翻清朝的起义获得胜利的客观形势,那么,武昌革命化的新军也就不可能建立起首倡义举的巍峨功勋。

如同本书第九章所曾叙及,1911年夏季以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动的局势,已日益显露了指顾可待的征兆。继设置所谓皇族内阁、宣布出卖全国铁路的“干路国有”政策之后,清政府竟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既断然拒绝立宪派人的请愿,又残暴地压制

湘、鄂、川、粤的保路运动；对各处群众自发的反暴政、反苛捐的斗争，依旧是一味地镇压、屠戮，其专横、昏庸、贪婪、卖国的行径，更形昭彰。于是，本来已经激化的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越发尖锐；其他一些次要矛盾，诸如延续 200 多年的满、汉矛盾，朝廷专擅集权的皇族亲贵和地方官绅之间的矛盾，迅速露头的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都到达非常紧张的地步。而夺路和保路的斗争，又可说是这些主要的、次要的矛盾的焦点。在武昌首义前夕，人民对于清王朝的厌弃情绪，无以复加；一小撮清朝当权集团的处境，空前孤立。在陕西流传着的“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sup>②</sup>的民谣，恰当地反映了 1911 年夏季以来的形势和群众心头的预感。

但起义首先在武昌爆发这个偶然性，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因素。不应当认为，只要有了革命在全国普遍发展这种必然性，则任何一个类似武昌那样地位的重镇都有可能获致首义的功勋。应该看到，尽管已经出现革命在全国发动的形势，但如果没有任何一处具有首先发难并获致胜利的条件，则好的形势就可能虚过去而不成事实，或者是革命因之延缓下来。所以，武昌为什么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是很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概而言之，武昌首义胜利，一方面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以来，湖北、武汉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各阶层人民反抗斗争迅猛发展，为首义成功提供了客观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湖北、武汉地区革命党人长期进行艰苦、扎实的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为首义成功准备了主观条件。

考察一下 20 世纪初期湖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加深。

控扼长江腹地的湖北，虽然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已被英国划入它的“势力范围”，但也正是这个时候起，世界列强之间也开始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竞争，其他帝国主义，特别是后



起的、暴发的德、日、美等国，都竞相打入长江流域，力图从老大的英帝国主义手中分取这块大肥肉。如同1902年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端方奏折上说的：“自近年创兴铁路，武汉为南北枢轴，长江商务日辟，已駉駉直达上游，于是天下大势日趋重于鄂中，各国之宾从络绎，电牍纷纭，几于日不暇给。”<sup>③</sup>这反映了湖北已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重点地区。侵略者在大大加强政治、宗教侵略的同时，还拼命在湖北城乡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霸占路、矿，开设工厂。随着京汉铁路在20世纪初的修筑和通车，随着同一时期帝国主义四处开辟内河轮船运输业，它们经济侵略的触角更深入到湖北内地。据统计，1898年汉口对外贸易总额是5300万两，到1902年，猛增至1亿两以上，到1910年，即超过1.5亿两，<sup>④</sup>短短的十一、二年内，剧增三倍，其数额仅次于全国最大的贸易口岸上海。武汉三镇有各种外国企业180家，其中80%以上都是1900年后建立的。这些怵目惊心的数字，集中地说明了20世纪初帝国主义在湖北经济侵略的加剧和加深。

在潮水般涌入的进口和外资工厂出产的商品中，最主要的是与湖北农民、手工工人命运攸关的棉纺织品。长期以来，湖北是盛产棉花的省区，用本地出产棉花纺织而成的土布，是驰名全国的传统手工业产品，陕、川、晋、豫、湘、赣、皖、黔、滇以至苏、粤，都是湖北土布的销售市场。仅陕西一省，19世纪60~70年代时还年销湖北土布值银400万两。土纺织“实为鄂民生计之一大宗。”<sup>⑤</sup>但是，19世纪70~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洋布的大量倾销，而为虎作伥的封建统治者对湖北土布强征“较咸丰初年贵逾一倍”<sup>⑥</sup>的重税，致使湖北土布遭受致命的打击，在外省销路锐减。如陕西“所行之湖北布无人买用”。<sup>⑦</sup>在本省，土纱、土布的命运也相类似。据海关报告，1896年沙市开埠之初，“洋棉纱并无销场”，而到1907年，在这个棉花生产和土纺织十分发达的地区，洋纱转而“销流颇畅”。<sup>⑧</sup>另一个包括宜昌、沙市在内的“长江中上游七口岸输入洋纱、国纱净量”的统计表则记载，1894~1898年

间输入洋纱净量平均每年 211 935 担,而到 1904~1908 年间,则增至平均每年 537 318 担,净增一倍半以上。<sup>⑨</sup>这样,“鄂民生计之大宗”就被帝国主义所剥夺。如果说,在帝国主义入侵最早的东南沿海地区,农民、手工工人“生计”之被剥夺,是在半个多世纪中渐次地进行的话,那么,在湖北,却显得特别急骤,特别酷烈。这次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短时期内遭受打击的灾祸,使得湖北无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急剧地被卷入了殖民主义商品经济的漩涡,坠入了飞速扩大的游民无产者的行列。

更值得提出的,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在湖北所引起的不安和纷扰。19 世纪末叶,因京津、津榆铁路、芦汉铁路芦(沟桥)保(定)段的兴修和通车而造成的大量农民、手工业工人、交通运输业工人及其他小生产者的破产失业,曾经构成为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境内迅猛发展的主要社会基础。转入 20 世纪,京汉铁路的通车(光绪三十四年闰四月黄河铁桥建成,全线通车),列强侵略者对粤汉、川汉路权的觊觎和劫夺,则使湖北产生了仿佛 19 世纪末年在直隶出现过的那番情景。

京汉路系比利时银行团贷款兴筑,“其损失利权、事权之故,实以路归借款公司管理,及均分余利、以路抵押三者为要害”。<sup>⑩</sup>清政府鉴于利权丧失太多,于是设法筹款收回。但又因国库窘乏,仍旧不得不迭向英商汇丰、法商汇理、日商正金等银行借款,作为赎路之用。事实上,无异是前门拒虎,后门引狼,路权仍隐然操于外人之手。粤汉路虽经鄂、湘、粤三省绅民力争,于 1905 年从美国华美合兴公司手里赎回,次年准归商办;川汉铁路也早在 1904 年即奏准自办在案,但后来张之洞借口“路长费巨,鄂尤贫困,非借款不能兴工”,<sup>⑪</sup>因而不断向外国财团洽商贷款,最后是 1910 年英、法、德、美达成协议,组成四国银行团揽取了贷款权。这三条铁路干线都通至武汉。铁路兴修给社会所带来的动荡,外国财团纷至沓来地图谋这些铁路的危机,波及的面是很广阔的,众多的劳动群众,新兴的资产阶级人们,爱国的地方士绅,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这种

事态的威胁和损害。川、鄂、湘、粤连成一片的保路运动的得失成败，也无不在武汉产生影响。帝国主义集中争夺湖北铁路所产生的祸患，无疑是激发武昌首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封建捐税的分外苛重。

清末捐税的繁杂，是和所谓“变法新政”分不开的。“新政”一多，官吏贪污中饱的法门就多，胥役敲诈勒索的手段也更多。久在湖北的张之洞是以厉行“新政”而在统治集团中素负“盛名”的，因此，湖北捐税之重，在各省中也就名列前茅。编练新军，张之洞是首倡者之一，他以湖北一省之力，编练了一镇又一混成协，为其他省所不及。<sup>⑫</sup>他所创办的官营厂矿企业数目之多，规模之大；他催令武汉和各府州县开设的军事、实业、师范、普通各方面的新式学校数量之多，用费之大，也是外省所罕有。他如办巡警（仅武昌、汉口两地每年警察费用即需 20 万两<sup>⑬</sup>）、办“自治”等项新政，均属如此。<sup>⑭</sup>本来，义和团运动后，湖北已分摊了清廷强派的近 200 万两（包括所谓“补镑”）的赔款，53 万两的练兵费，另又抽收 100 多万元的铁路租股，短时期内又骤加这么多的“新政”开销，以张之洞为首的湖北各级反动官府就实行——用张之洞自己的话来说——“竭泽而渔”，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对人民的搜刮。除了大幅度地增收地丁、漕折、“耗羨”、盐税、契税外，又创办各种新税，如学堂捐、质当捐、土膏捐、车捐、船捐、门捐、铺捐、签票捐、肉捐、戏捐、赈灾捐、烟酒糖捐、出产货物捐、炭捐、煤捐、柴捐、砖瓦捐、地基捐等等，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额很大，“有加无已，日不暇给”。<sup>⑮</sup>如学堂捐一项，每地丁银一两，就加收一串 300 文，等于是加抽一倍的田赋。另外，又滥铸铜元，滥印钞票。清末全国发行钞票总额约 2 亿元，湖北一省即占 3 000 万元。<sup>⑯</sup>铜元出数之多，亦“为省厂冠”，有时一日铸发至 400 万枚。<sup>⑰</sup>所以，一个多年在鄂、苏等省“当差”的官僚就记述称：“庚子以后，湖北筹款之多，甲于天下。”<sup>⑱</sup>19 世纪 50、60 年代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湖北巡抚胡林翼在省内的搜括就已“为天下最”，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张之洞又来一个“甲于天下”，湖北

人民的苦难较之他省就尤为深重。加上铜元、钞票泛滥成灾，成了吞噬人民生命财产的“无形之洪水”。在邻省只要四、五十文一斤的盐，在湖北却“每斤非一百六、七十文不可”。弄得全省到处是“米珠薪桂，民不聊生”。<sup>①9</sup>而地主高利贷者又趁火打劫，加紧兼并土地，增高地租和高利贷剥削率，这就使得大批大批的劳动人民堕入贫困、破产的深渊，连一些中小商人、中小地主也不能幸免。以至武汉市内各阶层人民都“十九咨嗟叹息，谓生理亏耗，输捐日多，衣食均艰，聊生何术？”<sup>②0</sup>

三是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人祸”带来了或助长了严重的天灾。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敲骨吸髓的盘剥，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自然灾害十分严重。1909~1911年内，汉江流域上自襄、郢，下迄汉阳、汉川各县，无不遭灾，特别是号称湖北谷仓的江陵、监利、石首、沔阳、潜江、荆门、公安等县，受灾尤重。洪水遍地，田庐淹没，“流亡载途，道殣相望，人至有相食者。愁惨景象，可为痛哭”。<sup>②1</sup>据1911年9月12日《华中邮报》记述：“1910年6月汉水、长江同时泛滥，武昌城内大多数低洼处被淹，汉阳兵工厂、铁厂、煤矿局、武昌纱厂被迫停产，鄂西、鄂南沿江地区大部分秋粮无收。9月，汉口天主教会报告说，湖北有两百万人流离失所。”<sup>②2</sup>仅沔阳一地，饥民即“有五十万之多”。<sup>②3</sup>成群的灾民涌入早已塞满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城市，造成武汉等城市人口的骤形膨胀。1910年，仅汉口一地，就聚集了20万饥民。其中许多是年富力强的“壮夫”，被迫“三五成群，于居民铺户门前强索硬讨”。<sup>②4</sup>省内城市人满为患，就成群结队地远逃外省，计进入同样遭灾的湖南的湖北饥民就达20万人。<sup>②5</sup>许多人辗转浮海流亡东北，仅在营口登岸者就将近万人。<sup>②6</sup>人祸天灾，交相煎逼，使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广大人民再也无法照常生活下去了。

社会矛盾的尖锐，必然导致群众自发的反抗相应地激化。20世纪初，湖北如同其他地区一样，人民群众的抗捐抗税斗争、反洋教斗争、反帝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反清起义，以及城镇工人罢

工、商民罢市等等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在各府州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尤其是破产失业的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相率拥入各城镇,愈益加剧了社会危机。武汉三镇和附近州县除了不时地掀起上述那些群众性的自发骚动外,还日益密迩地爆发了一股新兴势力的运动,即产业工人的罢工斗争。1907年,汉口铜币局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定额而罢工。1909年,汉口染业工人为保卫自己的生活权利而罢工;丰顺、阜昌、兴泰等外资兴办的茶砖厂八九千工人,为反对工头盘剥、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1910年,汉口谋家矶扬子机器公司工人为反对侮辱和压迫而罢工。此类斗争的频繁发动,更显示了社会矛盾迅速加剧的趋势。特别是1911年汉口人力车工人反对英国侵略者和反动官府的抗暴斗争,更引人注目。这次斗争曾经得到市区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商人罢市停业,新闻界也声罪致讨,并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大会,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的新罪行。这种登高一呼,万众啸集的情景,实际上已昭示了武汉很有可能成为一场革命风暴的策源地。整个湖北,从城市到乡村,普遍是“民怨且愤”;<sup>①</sup>推倒祸国殃民的清王朝,成为各阶层人民一致的要求。“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这首武汉“儿童争唱”的歌谣<sup>②</sup>,正反映出湖北革命形势的成熟和人民群众对行将到来的革命高潮的热切呼唤与殷切盼待。这就为湖北、武汉地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开拓了良好的形势,提供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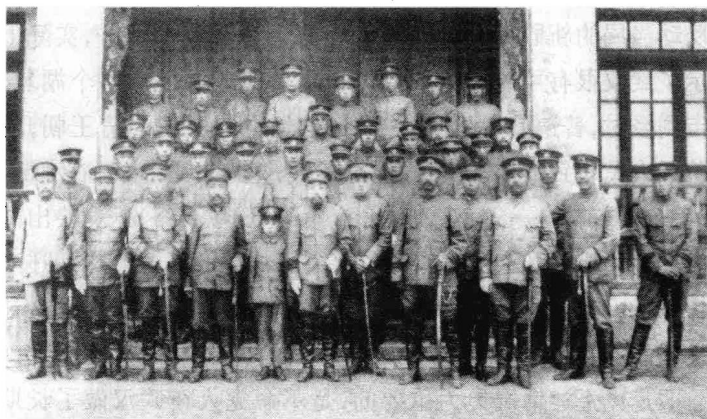
四是比上述情况更为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在武汉做了长期的健全组织、积蓄力量的准备工作。

和其他地区相比,武汉革命党人的组织工作确实做得较为踏实,积蓄力量也较为充足。这是和湖北新军数量最多(与各省编练的新军比较,北洋六镇除外),革命党人一直坚持在新军中秘密活动分不开的。

由各省地方当局自行筹饷编练的新军里,湖北的编练是较为认真的。1905年冬,张之洞就奏称,该省已练成的新军编为两

镇，第一镇按章制全部足额，计步队二协四标十二营，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官弁兵夫共 12 071 名；第二镇，则只步队一协两标，马、炮各一营，工程、辎重各一队，官弁兵夫共 5 188 名。<sup>⑨</sup>次年，经练兵处议复，第一镇编为陆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第二镇称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统领。而湖北革命志士，在建立科学补习所以前，就“俱认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sup>⑩</sup>因而相率投入新军充当目兵或低级官佐，秘密开展活动。所以，新军数量较多，就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清末新军所以能供革命党人利用作为倒戈起义的力量，其原因本书第四章已有所阐述。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性质和湖北新军一样，而数量更多，为什么北洋新军不曾产生像湖北新军那样的变化呢？



湖北新军全体将官合影

首先是因为，北洋新军较早就形成一支军阀武装，而湖北新军则还不具备此种性能。袁世凯从 1895 年开始在小站督练新建陆军起，即怀有建立私人军队的野心。北洋六镇高级将校，大多数是追随袁世凯起家发迹的所谓“小站旧人”。对所有将校兵弁，袁“向他们灌输了忠诚观念，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

忠”。<sup>④</sup>在这样一个派系森严、党羽固结的军阀队伍里，不仅革命者难以开展活动，就是清朝统治集团内其他派别势力，也不易楔入。张之洞则有所不同。这个封建官僚固然反动，但终究不失为有一定抱负的政治家，对创办官僚资本性质的工业、改革教育等，也尽心筹划，并非专以练兵为务，而且较为恪守儒家君臣之义的规范。他虽然也在自己创练的新军里安插亲信，严加控制，但并不像袁世凯那样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要编练一支归属自己的军阀队伍。正是基于此种差别，使革命者获得了在湖北新军里秘密存身的余地。

其次，在清末，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立宪请愿的接踵出现，以及一小撮满族亲贵的加紧专擅集权，中央朝廷和地方当局之间的矛盾经常显得很突出。而编练新军、兴修路矿、举办宪政等，尤其容易激起朝廷和地方的磨擦。由于这个原故，地方各级官吏就越发对朝廷采取敷衍推诿的惯技，以保持自己的权势禄位，维护贪污中饱的利益。湖北新军就曾因为存在这种情事而给了革命者潜伏隐蔽的机会。1904年华兴会起义事泄时，湖北方面也对科学补习所进行搜捕，后来，因武昌府“知府梁鼎芬（兼任新军参谋所、执法所提调——编者）以涉及其监督下之学堂（文普通学堂）学生，不敢兴大狱，仅开除欧阳瑞骅、宋教仁学籍寝事”，<sup>⑤</sup>1910年春，湖广总督瑞澂鉴于广东发生新军起义，“即欲将鄂中新军严加清查，以别良莠，嗣经张彪力保”，<sup>⑥</sup>瑞澂也就只好作罢。稍后，因湖南发生“抢米”风潮，湖北革命党人黄申芎、刘复基、查光佛等议响应发难，“适湘事即平，武昌机关因陆军学生孙昌复自汉口潜运炸弹进城事泄。统制张彪恐激成大变不深究”。<sup>⑦</sup>自组织科学补习所起，湖北革命党人除1907年初日知会被破坏有9人遭缉捕入狱受到较大打击外，一般都因张之洞、张彪等弥缝息事而隐蔽下来，得到发展。

继科学补习所之后的革命团体为“日知会”。日知会是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设立的“传宣西教”<sup>⑧</sup>的阅览室。当科学补习所遭到破坏时，其组织者之一的刘静庵因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有交情，因

而得以避住会内。不久,他受聘充日知会司理,于是着手利用这个机构,“联络军、学两界中人,以为革命之预备”。<sup>⑤</sup>原科学补习所的成员相率入会。1905年冬,刘静庵遂“商准胡会长,另拟会章,由传教进而革命,名不变而实变矣”。<sup>⑥</sup>次年2月,作为革命团体的日知会正式成立。

日知会的革命者仍然坚持他们原来的信念,即着力在新军和学生中开展工作。他们每逢星期日都举办讲演,宣传民族危机,抨击时政。而暗中则输进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及其他革命书刊,并在黄州设置秘密印刷所,大量印刷《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黑龙江》、《作新民》、《训兵说》、《孔孟心肝》等宣传品。除了在武汉的士兵和学生当中散发外,还把一部分直接“分送”到外地县城和农村,<sup>⑦</sup>当时军界、学界倾向革命的人们,几乎人手一册,有效地启发了人民的觉醒。与此同时,又设立了江汉公学、东游预备科、明新公学,以造就革命干部。半年时间里这个组织迅速扩大到近万人。<sup>⑧</sup>并且影响到江西,如九江的开化阅书报室和平民学校,南昌的开化阅书报室,都是当地革命知识分子模仿日知会而创办的。<sup>⑨</sup>

日知会卓有成效的活动,受到了孙中山的重视。1906年4月,孙中山派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sup>⑩</sup>回鄂,在日知会中发展同盟会会员,扩大同盟会组织。刘静庵、冯特民等首先加入,不少会员也相继参加了这个资产阶级政党。这样,日知会在组织上与同盟会发生了联系,在政治上接受了他们早已瞻望的“共主”孙中山的领导。<sup>⑪</sup>从此,日知会的性质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表面仍称日知会,内容实为同盟会”了。<sup>⑫</sup>

随后,日知会遂转向革命行动。1906年4月间,刘静庵派吴昆到香港见黄兴,商讨起义事宜。旋至日本,受孙中山派遣,跟随法国武官欧几罗到长江中游一带视察,准备起义的工作。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派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到武昌,与张难先、季雨霖、刘静庵等在汉阳伯牙台举行会议。议定党人一面筹款,一面



应招入营,使能“缓急待用”。<sup>④</sup>不料萍浏醴起义迅速失败,有奸细郭尧阶向巡警道冯启钧报告了日知会的响应计划。1907年1月13日,湖北当局派兵包围搜日知会,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刘静庵、张难先、季雨霖、殷子衡、吴贡三、李亚东等主要领导人被捕。不久,仅张难先、季雨霖得保释出狱;朱子龙不幸于次年春病死狱中;刘静庵于武昌首义前三个月在狱瘐死;吴贡三、殷子衡、胡瑛、李亚东、梁钟汉等五人到武昌首义后才出狱。

日知会存在虽仅一年,但在湖北革命运动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的主要工作和主要贡献是在革命宣传方面。许多知识分子阅读了各种革命出版物后,“经过一段时间,推翻清朝的思想在多数同学中滋长起来了”<sup>⑤</sup>。它像辛勤的播种者那样,在湖北,特别是武汉大地上撒下了种子,为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日知会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它的社会基础不够广泛,成员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军中则着重于联络官佐。<sup>⑥</sup>这样,就必定会影响其战斗力。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严格的组织建制,不能把参加成员组成一支战斗的队伍,一经敌人查封,领导人被捕,就像碎盘的珠子那样散落在四方。

以后,湖北革命党人的组织活动和革命活动,被迫停顿了一年半之久。但全国工农群众的反抗斗争迅趋高涨,同盟会在南方也举发了连绵不断的武装起义。这些斗争的震幅,在湖北激起了革命波澜。湖北和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总结了日知会的教训,看出了同盟会在南方边陲地区“屡起屡蹶,不关清廷要害”的缺点,决心在长江腹地组织力量,用铁和血发展革命运动。<sup>⑦</sup>日知会会员任重远、李长龄、黄申芑以及在狱中的李亚东等,决心重整旗鼓,并立即得到了日知会会员及其他革命者400多人的赞同。

1908年7月,经过半年多酝酿和准备,在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了军队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其成员多数是新军中的革命分子。虽然,到11月这个组织就陷于停顿状态,但却使分散而处于沉寂